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ДНЕВНИК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г.



1907年中国纪行

〔俄〕瓦·米·阿列克谢耶夫◎著
阎国栋◎译



非外借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1907年中国纪行

〔俄〕瓦·米·阿列克谢耶夫◎著

阎国栋◎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07 年中国纪行/ (俄罗斯) 阿列克谢耶夫著; 阎国栋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 8
(行走中国丛书)

ISBN 978 - 7 - 222 - 13271 - 9

I. ①1… II. ①阿… ②阎… III. ①游记 - 中国 - 近代 IV. ①K928.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3306 号

出品人
胡 平
项目负责人
赵石定

责任编辑 王 韬 毛 雪
责任校对 郑燕燕
装帧设计 王曦云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洪中丽

1907 年中国纪行

[俄] 瓦·米·阿列克谢耶夫 著 阎国栋 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出版印刷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13271 - 9
定 价	40.00 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 - 64164626 出版部电话: 0871 - 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АКАДЕМИК
В. М. АЛЕКСЕЕВ

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
ДНЕВНИК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г.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8

总 序

张昌山

从黑格尔以来，传统中国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者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这一观念出现几十年之后，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李氏又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对世界和中国的这种认识还在多个场合说过。当时的中国，一下子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迅速跌进五大洋、四大洲之中的世界，甚至只是亚洲东部一个落后的大国。

这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是以工业革命为主导的近代化及现代化，而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一近代化及现代化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百年间，一些中外人士行走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在变动的土地上。行走者中，既有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探险家，更有中国的文人、学者、科学家、商人、军人，甚至有家庭妇女。他们的游记、札记、考察报告、探险实录等，见证并记录了其自身行走的经历和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过程。当时写下这些文字的人虽身份各异，目的不同，但每一部作品记录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察与体验，也记载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个性特征。而不同的作品拼合起来，则在横向空间上似画卷一般展现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而在纵向的时间上则有如电影

一样显示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细节与大势。在他们笔下，中国不再是故纸堆中的陈旧记忆，而是活生生展开的现实景象。

把历史还原到现场和实际生活，这大概是每一个想了解历史的人的最大愿望。我们从这些作者在中国的行走、体验之中看到了一种活态的中国历史，它们明显区别于以往的正史和官方档案之类的文献资料所记录的静态中国历史，而且，人生的丰富性、视角的差异性及社会的多元性，也尽在其中了。

德国学者赫尔德所倡导的“同情之理解”，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学者中以陈寅恪等用得最深也最好。如今，我们把这些中外作者的各类作品作为历史文本来阅读、感受和研究，通过这些文本去体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行走、见闻与思考，这也是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实践。今天的人们可以从中感受这些作者所体验的中国社会，从而更具体更深刻地观察了解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进程的艰辛与经验。

将中国放在整个世界大格局中来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大致就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的过程。鉴往才能识今和知来，但由于过去的观念、方法、习惯和经验等因素，有意无意地遮蔽和塑造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与解释，因此，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行走中国”大型丛书，是在回头观看百年中国之动静，是在体会“我看人看我”的经验，其实质则是向前进，走向永恒的未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洪流和时代的浪潮虽然可能会被拖延，却不可能永远被遮挡。司马相如曾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李鸿章有言：“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这两句话的时间相差两千年，表达的却是同一种心声，谨抄录于此，作为我们对国家和时代的期许。

是为序。

2015年5月



译者的话

《1907年中国纪行》的作者是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汉名为阿理克，1881—1951）。他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汉学家，终身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他翻译的《聊斋志异》、古典诗词歌赋以及古代文论信达雅兼具，为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经典翻译树立了典范；他的中国文学研究注重对文本的解读，最早尝试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他于清末民初在华收集中国木版年画数千幅，开创了俄罗斯的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他为苏联汉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者，缔造了“阿理克学派”。

本书是阿列克谢耶夫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在中国的旅行日记。这一年他同法国汉学家沙畹进行了一次学术考察。他们从北京出发，经天津，沿大运河到山东，而后游历了河南、陕西和山西。所到之处，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的社会、历史、宗教、教育、艺术和民情风俗无不详加记载。他总是能捕捉到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人、事、物，进而用一种尊重甚至敬仰的态度，以世界文化的视野，记录下所见所思。阿列克谢耶夫曾这样说：“这些日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即将获得新生的旧中国的唯一



青年时代的阿列克谢耶夫（汉名阿理克）

见证。这是俄国第一位懂汉语、对有4000年历史的伟大的中国文化怀有深深敬意的旅行者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旅行日记。”他相信东方和西方这一对“‘孪生儿’一定能相遇并且将为全人类开辟广阔的前景。西方精神对东方精神的回应将创造出新的生活、新的人、新的文化”。他在日记中表现出的尊重中国文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强烈情感足以触动每一位读者的神经。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这本旅行日记以其严谨的科学研究精神和深厚通达的文化理解力见



证了中华帝国古老文明的过去与现在，以其超前的东西方文明平等观念解构了长期以来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偏见的中国形象，它不仅成为俄罗斯人反思民族传统、现代化历程的‘他者之镜’，也成为我们反观自我形象、确证自我身份的一面宝贵的镜子。”^①因此，阿列克谢耶夫的旅华日记在内容上更像是一部中国文化随想录。俄罗斯汉学界也从没有将其看作是普通的游记作品，而是一直视之为汉学家认识中国文化的门径或从事汉学研究的指引。

此书俄文本于1958年由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和后人共同整理出版，而后有德文本（1989年）、中文本和意大利文本（2008年）三个译本问世。中文本于200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称赞此书“译笔流畅又老到，涉及那些古老事物，都译得十分精准”^②。济南大学岳巍副教授发表《高山流水知音在——读〈1907年中国纪行〉》，认为译本不仅译文忠实，而且“传达出了原作的思想风格和精神”^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教授以此书为基础进行形象学研究，发表了《他者之镜：〈1907年中国纪行〉中的中国形象》^④。“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陈相因博士发表了《俄苏东方学之跨学科文艺批评与比较文学方法：论阿列克谢耶夫的〈1907年中国纪行〉》^⑤。

《1907年中国纪行》是我1999年开始涉足俄罗斯汉学研究领域后的第一部汉学译著，也是阿列克谢耶夫的著作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我在2001年出版的中译本的后记中曾经特别感谢过两个人，一位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女儿班科夫斯卡娅女士。从我翻译此书的第一天起，就与她保持着密切联系。她将我与阿列克谢耶夫的缘分比喻为“子期遇伯牙”。她不仅授权我在中国翻译并出版此书，而且还为我的译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为中文版作了序。在以后的几年中，班科夫斯卡娅不断寄来有关阿列克谢耶夫的文献和照片，对我认识这位苏联汉学奠基人的学术生涯和成就给予了很大帮助。2006年我在俄罗斯出差时曾到家中拜访这位可敬的老人。她放弃了自己的生物土壤学专业，将半生时光献给了整理和出版其父遗著，并在临终前完成了《阿列克谢耶夫与中国：一本关于我父亲的书》一书。2009年班科夫斯卡娅女士永远离开了我们。第二位便是与我有长达十余年学术合作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先生。作为阿列克谢耶夫的弟子，李先生听说我正在翻译阿列克谢耶夫的日记后非常高兴。2000年7月，他写了一封5页的长信给我，就翻译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向我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在随后的翻译过程中，通过书信或传真，我仍然能不断得到李先生的帮助。其后，我协助李福清先生在中国出版了《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1839—



990)》《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等书。2012年李福清先生去世后我和冯骥才先生合编了《李福清中国民间年画论集》。此次再版《1907年中国纪行》可以说是对两位逝者的一种怀念。

《1907年中国纪行》中译本从2001年初版发行到现在过去了15年，在各大图书网站已经缺货多年。即使是有学者索赠，我也只能碰运气到旧书网站上高价淘购。为了更好地回馈读者，同时也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厚意，今年我对译稿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增补了部分插图。此外，云南人民出版社高度负责的编辑和出色的装帧设计，也将有助于新版《1907年中国纪行》一如既往地受到读者的欢迎。

2012年，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资助下，由李福清院士担任责任编辑，俄罗斯出版了该书俄文本的增订版，在原书基础上增补了阿列克谢耶夫1908—1909年和1912年在中国南方地区的旅行日记。本次云南人民出版社列入“行走中国”丛书再版的只是《1907年中国纪行》2001年中文版的修订版，并不包括俄文新版增补部分。

阎国栋

2016年8月18日

注释：

①刘燕：《他者之镜：〈1907年中国纪行〉中的中国形象》，《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

②冯骥才：《倾听俄罗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③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7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24页。

④《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

⑤《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3年第2期。



中文版前言

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及其华北之旅^①

有少数学者不仅能够巩固前辈学人所开拓的领域，加深对其了解，而且还能够扭转其发展方向，重新阐释他们之前的科学。此书的作者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就属于这类学者。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位学者承担了这种使命，而不是其他人、其他专家和天才？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深思的问题。该学者所具备的某种全新品质成为科学本身的新属性。可又是人类的哪些特性决定了他的品质呢？

“要直视人世间的一切，而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并轻信那些无稽之谈。”——这是阿列克谢耶夫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对学院新生讲的话，那时的他已年近花甲，这既是他的欢迎词，也是临别赠言。“直视”似乎很容易做到。但是，这件最简单的事情却不是认识的底层，而是顶峰。直视的目光中没有成见，不故作姿态，这大概是阿列克谢耶夫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但这又是为什么呢？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决定的，还是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有一些幸运的人可以像踩着跳板一样青云直上，迅速达到目的。尽管阿列克谢耶夫没有这样的童年，但他生命中的许多东西却是由他的童年所决定的。1881 年 1 月 2（14）日^②他出生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工厂区。普希金曾这样描写那时的圣彼得堡：“贫穷的城市，禁锢的灵魂……”他的父亲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是一个没有专长的工人，晚年曾在一家弹药厂做抄写员。家里有许多孩子，但只有瓦西里和哥哥格奥尔基长大成人。家中非常拥挤，与其他同样是工人的家庭为邻，所不同的是他的父亲没有酗酒的恶习，也不打老婆，而是把教育儿子视为生活的主要目的。所以，瓦夏^③成了初级中学的学生，他那些做仆人的朋友们因此送了他一个轻蔑的外号——“小中学生”。

瓦夏 10 岁那年，父亲患了重病。他记得他如何在拉丁语词典中寻找“cancer”^④这个词，但那不是他的功课，而是他在医生留下的一张字条上看到的。父亲死后，母亲按照他的临终嘱托，没有听从左邻右舍要她把儿子送去学手艺的



劝说，阿列克谢耶夫因此能够继续在中学学习，后来他成了“有培养前途”的公费生。

他的童年岁月充斥着醉鬼们的辱骂，人们拨弄是非，飞短流长，他时常提心吊胆地面对警察，甚至对管院子的人也感到恐惧。所有这些促使他极力排斥自己生活环境中各种各样的愚昧现象。那些黄昏时光成了他童年唯一的欢乐，备受野蛮生活折磨的人们（大部分不久前还是农民）聚集在厨房的炉子旁边，突然变了样子，他们尽情歌唱，讲述故事和传说，这些都深深地留在他记忆和心灵之中。他获取美学感受的另外一个源泉是教堂活动（早在上中学时期他就被吸收进当地的唱诗班，然后又在教区的教堂里认真而准确地朗诵圣经中的诗篇，大部分词句一生都未曾遗忘）。瓦西里本人认为那种儿童的宗教热情并不具备宗教基础，而仅仅是摆脱苦难生活的一条出路。

尽管家庭未能给予他任何早期教育，但却教会了他劳动的本领以及只有劳动者才拥有的信念，那就是，生活不是游戏，要凭自己的良心去工作，而不是因为恐惧才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也可以这样理解：小男孩天性中蕴含的渴求知识的欲望在童年时期从没有得到过满足，所以，这种“吃不饱”的经历后来可能就变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饥饿”，促使他不知疲倦地“吞食”无穷无尽的知识。他才能出众，在中学获得了古典语言“行家”的声誉，与此同时，他还迷恋数学课，并且一生都感到他有一种要献身科学的总体志向，而非局限于个别领域。他认为，这种总体志向就是系统思维的本领和需求再加上工作能力，而所有的科学都是有意义的。他自己承认当初对东方研究没有丝毫偏爱，而且一无所知。他听从了一位中学老师的建议，决定进入东方语言系学习。阿列克谢耶夫选择专业是用拈阄的方式决定的：他抓到了一个写有汉满语专业的“阄”。

他于1898年考入的圣彼得堡大学令他大失所望。19世纪的俄国汉学巨匠瓦西里耶夫（即王西里）已处于其生命和活动的后期，他所创立的学派为科学研究中国奠定了基础，尽管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但也存在有目共睹的不足。这些不足首先从总体气氛中就能感受出来：阿列克谢耶夫悲伤地回忆到，教师们没有对新入学的学生表示欢迎，反而劝阻他们。教师们认为，抽象地研究中国无异于虚度光阴。教学方式也与中学一样：“……在完全不懂文本意思的情况下死记硬背，语法没有规则和明确的思想，毫无意义的翻译令人惊讶……丝毫没有大学的味道，也没有上过任何导论课程。”

众所周知，对年轻人影响最为敏感的大学生圈子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些不加



掩饰的仕途追求者（那时，经哈尔滨到北京的东清铁路开始建设，愿意进入汉语专业学习的人很多），他们将大学课程看作是要花费4年时间的必要环节，以便最后拿到文凭——稳固的美差。阿列克谢耶夫在自传中写道：“我的同学们说服我相信唯一重要的课程是……英语，对外交官的实际生活大有用处，——而学习其他所有课程只是为了得到文凭，——不知为什么，我却没有领会这些神机妙算，全然无私地奔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攻克文本障碍……”

有必要仔细思考一下这个“不知为什么”。确实应该思考一下，这个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最看重生活“安排”的环境中，可他怎么会对所有实用倾向表示出顽强的抵制？这是科学热情吗？“不知为什么”……后来，阿列克谢耶夫将“科学热情的严肃性”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按照他的意见，“科学热情的严肃性”是不能伪装的。难道，这就是他对学者志向的定义？这种志向如同音乐家和画家的志向一样特别。

从许多阿列克谢耶夫的自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起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曾为这个“不知为什么”而痛苦和茫然（在他的日记中，这句话重复了许多次）：他曾为在得不到必要帮助和指导的情况下克服汉语的巨大困难而茫然，也曾为缺乏某种科学前景而茫然。在感到茫然的同时还要为“随处破灭的灵感而苦恼”。4年顽强劳动换来的是“不具备阅读所需的外语水平，就连汉语也没学会，而且，这种糟糕的情况非常可怕和明显，不能理解任何一个长句子的意思”……但是，毕业后他仍然没有选择那条更为轻松也更“有油水”的生活道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进入外交部工作的机会而留在了大学。

当然，大学岁月中也包含了一些很大的成功。阿列克谢耶夫总是对他的老师以及曾帮助他“得见光明”的师长们心存感激。也曾有过令人幸福的同学关系，也曾有过在大学图书馆里“疯狂”苦读的夜晚。也曾沉迷于具体的科学材料：他受邀在皇家艾尔米塔日博物馆整理中国和日本钱币藏品时，发现了钱币形状的护身符——中国人挂在脖子上用来避邪的铜铸牌子。无论在图案中还是在题字上，都包含有许多符咒和各种各样的祝愿，充满有意设计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玄妙，要搞清楚这些是当时力不能及的事情，这也是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民俗和民间宗教产生兴趣的开始。

1904年，阿列克谢耶夫被派往欧洲继续为开始授课做准备，同时进行教学法方面的提高。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老师，著名印度学家、科学院院士鄂登堡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是俄国东方学杰出的组织者，一直致力于“将俄国东方学欧洲化，将俄国东方学纳入世界文化的总体架构”。鄂登堡几乎同世界东方学界的所



有人相识，给阿列克谢耶夫写了一大堆介绍信，帮助他与欧洲学者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大英博物馆里，他完全着了迷：“简直难以想象，我是如何神魂颠倒地醉心于这个对我来说全新的世界，这与靠阅读古典格言枯燥无聊地苟且度日大不相同。”在博物馆的钱币部，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了钱币形护身符，越来越倾向于以此为题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对他产生吸引力的是蕴含其中的古老传统，要想将其阐释清楚，不仅需要具备渊博的文学知识，而且还需直接认识这个民族，因为那些传统至今还在这个民族中流传。阿列克谢耶夫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因为欧洲的工作结束后他将去中国进修。

巴黎时光是阿列克谢耶夫在国外学习的高潮期。在法兰西学院，他听了著名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的中国历史讲座，跟随鲁斯洛^⑤神父开展语言学研究。沙畹的讲座征服了他：“每次听他的课我都能获得许多思想……对我来说，做沙畹的学生是一种永远愿意体验的美好享受。”在柏林的民俗学博物馆，阿列克谢耶夫观看了圣彼得堡大学前毕业生顾鲁柏^⑥带回的藏品，同他讨论了中国民间艺术和宗教的题材问题。其后，得到沙畹赞同的关于护身符题目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

在语言（英语、法语、德语）学习上的成绩是阿列克谢耶夫在欧洲期间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他能够用这些语言讲课、翻译、通信。尽管阿列克谢耶夫具备语言学习所需的所有天赋，但对于在童年时期没有获得任何语言积累的他来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有一件趣事可以说明他通过全神贯注的学习而取得的成绩，在伦敦期间，阿列克谢耶夫驾驭“词汇”的能力令英国人感到窘困，除了所谓的语言学知识带来的方便外，在古典中学学到的拉丁语也帮助了他，使他随时可以用拉丁词根造出新词来。

当阿列克谢耶夫步入晚年后回顾自己开始科学工作的那些年头时，他做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总结：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4年，然后按照自己制订的广泛计划学习了2年，接下来是在欧洲的2年。照他自己的说法，这8年仅仅是他在中国获得新生的准备期。在中国，他在思维方式和文化修养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转折”。这种转折有时是痛苦而艰难的，但最后却总是幸福的。

从1906年秋天起，阿列克谢耶夫开始了在中国的学习生活。在先生们的指导下，他开始紧张地阅读古典文献。他在从北京写给鄂登堡的信中说道：“……早就想给您写信，但因为忙于背书，连写信的时间也没有。每天学习12个小时，可我还是不满意，总是积压着需要紧急处理的事情，而且经常都是如此。……我有4个老师，对他们都很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先生们竭尽全力，总之，我



的工作进展顺利。一位先生说：‘与喜欢干活的人在一起干活是愉快的。’在准备晋升教授期间，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就像他早先在圣彼得堡，而后在欧洲一样，继续按照自己制订的最广泛的计划学习，内容涵盖了汉学文献以及数量巨大的原版中国古典著作。先生们的参与有助于加深对阅读内容的理解，但却不能帮助他掌握文本。具备阅读复杂的汉语文本的能力不仅对于学习古典作品是需要的，而且对于阅读报纸也是必须的：20 世纪初期主要使用古代书面语言——文言，所有的文章都用文言写成，看报纸并不比阅读本世纪初的论著轻松，有时甚至更加复杂。阿列克谢耶夫遇到了许多困难，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没有松懈。而且，丰富的民俗学资料燃起了他从前对民俗学的兴趣，他立刻以特有的热情沉迷于资料收集，并将其变成整个科学活动最重要的方向之一。

首先对他产生吸引力的是春节前印制的彩色版画——年画。好在这种画价格低廉，阿列克谢耶夫立即开始大量采购，搜寻无数种不同的样式。必须要搜寻，寻找出售这种货的小铺子。此外，年画只在某些月份（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前）出售。

要获得对这些充满象征意义的画的阐释同样困难。阿列克谢耶夫明白，必须在地搞清楚这种鲜活的材料，否则以后将没有任何文献可资参考。比如，一个快乐奔跑着的儿童，一只脚光着，另一只脚上穿着草鞋，这表达了一种愿望：风调雨顺。谁能想到会是这样呢！他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曾琢磨过一幅类似的画。那幅画是偶然进入大学里的，但他对画上的内容百思不得其解，中国讲师看了一眼这幅画后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而现在先生们也流露出同样的表情，对这个古怪的年轻人的行为大惑不解。他不像其他外国人那样游玩，而是走街串巷寻觅那些他们认为是粗制滥造的便宜画；然后还要纠缠不休地问这问那。最后还是这个怪人的顽强精神占了上风，他用自己诚挚而永不知足的探索精神征服了先生们。当然，有时还得做点交易。当他获悉一位先生在翻译一些德语文章时遇到了困难，就提出愿意效劳，但条件是后者必须用对年画内容和象征意义进行书面解释来交换。当遇到难点的时候，先生们就请不识字的老妪来帮忙，因为她们从小就从画和刺绣上了解了其中的所有奥妙。

画上也有与护身符上一样的图案，阿列克谢耶夫立刻用它来充实已经收集到的材料。另外一个材料来源是大量的街头题字——中国特有的日常题铭。阿列克谢耶夫从黄色和红色的纸上抄写那些用来装饰住房、寺院和衙门门框及阳台的书法楹联。解释清这些吉祥的句子又成为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其中既蕴含着文学佳作，也有民间传说。用耳朵捕捉民间口头创作就更难了：阿列克谢耶夫记录了



商贩的叫卖声、盲人在大门口乞求施舍的唱词、摇篮曲和儿歌。其中摇篮曲和儿歌是在熟人家服务的一位中国保姆应他请求而唱的。

应该指出的是，阿列克谢耶夫在北京大街小巷搜寻年画和题字，寻访并请教懂行的居民，参观庙宇的同时，一直跟随先生学习，独立阅读书籍，而且还经常系统地研究汉语语音学，这在法兰西学院时就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阿列克谢耶夫是第一位用实验方法（而不是用描述的方法）对汉语进行研究的汉学家。在中国期间，他一边努力获得准确的发音，同时继续自己的实验（为此他还从一个外国牙医那里订购了一个人造上颚，这是鲁斯洛仪器糟糕的仿制品）。

当你了解了阿列克谢耶夫所从事的大量工作和感受时，便会明白，尽管他取得了飞速进步，可为什么他还是感到面临的任务（尽管许多任务是自己确定的，但这不能改变什么）难以攻克，强烈需要得到真正的科学指导。此时此刻，又一个幸福的意外机遇使他得以和沙畹重逢：1907年5月10日，他在环绕北京的城墙边迎接了自己不久前的教授和偶像。

沙畹肩负科学使命而来：这位研究司马迁（公元前2—前1世纪）《史记》的出色专家和译者，现在想实地考察汉代遗迹。阿列克谢耶夫请求允许加入考察团，沙畹热情地同意了。他们雇佣了摄影师、拓印师（做石碑拓片的师傅）、仆役。5月16日，队伍离开北京城。阿列克谢耶夫的旅行就这样开始了，为此他共学习了8年多的时间。尽管后来于1909年和1912年他又在中国南部和沿海地区旅行过，但他只把自己的这一次旅行称作“是可贵的阅历，其意义不可低估！”

但是，旅行不仅仅是一种阅历。读者们将会发现，旅行始终伴随着紧张的科学劳动并且成为俄国汉学史上职业学者进行的首次旅行：此前曾在中国旅行过的俄国人中没有一位是汉学家。

沙畹仔细研究了大量考古文献，考古活动是按照他预先制定的线路进行的。他们的旅行轨迹是从一处古迹到另一处古迹，主要是一些石碑，上面刻有中国北方常见的公元前后交替时期的图案和文字。拓印师老宗叮叮当当地挥动着拓锤，“印刷”覆盖在涂满墨汁的石头上的纸，敏捷地做出拓片。尽管古代石碑拓片已经不属于阿列克谢耶夫所研究的民俗学范畴，但同样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西安“碑林”是一个独特的博物馆，那里收藏有1000多块碑碣，其中有些碑上刻有“十三经”的全文（公元9世纪刻），这在阿列克谢耶夫的日记中有记述：“我谈妥了购买这些碑碣的成套拓片。这将是欧洲第二大收藏。想到我将拥有一套这样的拓片，不禁热血沸腾，收藏家的癖性发作了！”后来，阿列克谢耶夫用碑林的拓片材料写了两篇文章，可见他的兴趣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



读者将会看到，同老百姓直接接触对阿列克谢耶夫来说可谓得心应手。他本人认为他能够轻松自如地谈话的原因是他不怕“鹦鹉学舌”——直接而公开的模仿。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进入他人世界时保持心理上的轻松，这种轻松是由阿列克谢耶夫的出身所决定的：他同农民、车夫、和尚们交谈，不受其志趣所感染，而是平等地与之交流，理解他们的行为和心事。20年以后，在派自己的一个学生前往中国时，阿列克谢耶夫为他制定了详细的任务，其中除了大量的科学指示外，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话语：“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中国人当作一个民族学研究对象来解释，要平易近人，真心实意地对待他们。”

两位旅行者的科学追求有时相同，有时不同。从阿列克谢耶夫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所有令沙畹着迷的事情，他在行进过程中（也就是当他们在漫长的道路上走着的时候）激动地与自己的同伴所谈论的事情，都能够得到对方最热烈的回应。但是，“使命的双重性”有时不可能不导致一些分歧：吸引沙畹向前的是野外考古，而阿列克谢耶夫则很想在城市多待一段时间，这里既有年画，也有题字，还有庙宇。此外，颠簸的马车，4个月的艰苦跋涉，不可避免的路途变故，都是对性格实实在在的考验。这对阿列克谢耶夫来说非常艰难，他没有受到过抑制感情的训练，对所发生的事情总是反应强烈（他经常为此而痛苦，特别看重人的忍耐力和教养）。就连不苟言笑的沙畹也难以永远固守本色。尽管如此，“危险”场面总能得到化解，不致演变为争吵。阿列克谢耶夫在日记中消除了对“性急的书呆子”的愤怒，接下来写到了对沙畹的感激之情：与之进行的科学对话好似甘泉滋润着我。“我与沙畹久久地、饶有兴趣地交谈……我如饥似渴地聆听他的教诲”，“我们友好地高谈阔论”，等等。阿列克谢耶夫一直对自己的法国老师心存感激，将他与自己的俄国老师一样看待：“我非常感激他，他给予了我一个教师通常给予学生的一切东西，更主要的是，我为自己建立了一系列科学目标，获得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更准确地说，是沙畹指导了阿列克谢耶夫，而不是领导了他：“我很幸运能与沙畹相识，但我走的却是一条独立的道路，对广泛的文化问题进行研究。”这里既有感激，也包含了对自己独辟蹊径的清醒认识。

当谈到一个学者的旅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旅行（行在旅途）本身只是巨大劳动的可见的外在部分，其基础则是所受到的培养（即教育）而其任务则是研究，从收集和整理所得的资料开始构建自己的研究。回到北京以后，阿列克谢耶夫恢复了对中国文学和语言的学习，同时顽强地、几乎每天都在整理自己的收藏以及包含有各种民族学信息的大量汉字题字。他重新开始同先生们以及许多专



家工作，他们依照阿列克谢耶夫专门制定的民族学征询表给予他清晰的阐释。学习的成果是数百张布满先生工整汉字的纸张，其中包含了非常独到的信息。阿列克谢耶夫收藏的 500 幅年画得到了描述，解释了各种象征意义，转述了神话和传说、戏剧和文学情节、道德说教、行为准则、迷信预兆，等等。阿列克谢耶夫收集到的日常金石学和寺庙金石学材料与年画题材桴鼓相应，因为“中国的民俗和宗教很容易合而为一，不大可能区分清楚”。

这样，整理各种各样的材料和旅行成果几乎成了阿列克谢耶夫科学积累阶段最复杂繁重的劳动。应该说，在世纪之初，当他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任何有关他所研究问题的文献。他所拥有的少量参考书，既无注释，也无索引，所以，为了某一句引文（这样的引文几乎在每一句题字中都有）都必须“大海捞针”。阿列克谢耶夫就不遗余力地从事过这样的“捞针”工作（不难想象，如果他能够看到中国目前大量出版的各种文集、参考书、词典……一定会露出欣喜的目光）。我们不能不感到惊讶的是，阿列克谢耶夫以他的热情和机敏，努力用活生生的传统证据来弥补文献的不足。但是，他在寄往圣彼得堡的一份报告中坦然承认：“还是有许多东西难以理解。”

这里需要做一个特别重要的说明。阿列克谢耶夫总是不失时机地向店铺的商贾、印刷坊的画匠、庙里的僧人以及身边没有表现出“不知所措的好奇心”的百姓请教。读者将在阿列克谢耶夫的书中与拓印师老宗相识，他是一位“很好的民俗学知识提供者”。与此同时，阿列克谢耶夫坚持认为，“记录道听途说的民族学家”如果不具备科学谨慎的批评态度，“会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阿列克谢耶夫积累的那些写满各种解释的纸片，是他最珍贵的野外资料，需要进行耐心细致的科学研究。

在从活的传统源泉中汲取信息的同时，阿列克谢耶夫也对“源头”本身进行了观察。在旅行途中，阿列克谢耶夫从未停止过对年画的研究，在生产年画的作坊里，他同画匠先生们交谈。这经常是一些略通文墨，在多层次的中国文化中间阶层中又处于下层的人。年画复杂的模式就是在这个中间阶层中经过数个世纪的创造和综合而形成。与和尚和道士们的交谈促使阿列克谢耶夫明白了宗教——哲学学说何以演变成独特的行为规矩，以及对宗教的实用态度使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存在的寺院宗教混杂现象成为情理中事。这又直接影响了民间神仙画像的风格，这方面同样是一片混乱，手工艺人的介入使情况更加严重，他们“把自己的职业想象模式融入了宗教神像程式”。

阿列克谢耶夫长时间与之交谈的寺院里的和尚们也是活的传统的源泉。在